



总书记脑海里印象最深刻的湘江战役

□ 王光鑫

4月25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广西考察第一站，首先来到位于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他强调：“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并指出这一战“在我脑海里印象是最深刻的，我也讲得最多”。湘江战役之所以关系到中国革命的生死存亡，在于它付出极大牺牲后保存了革命的火种，战役的惨烈使得党内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达到了顶峰，从量变渐至质变，成为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中渡过的第一次严峻危机

由于“左”倾错误领导，中央根据地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原来推行“左”倾错误方针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这次战略转移变成了“雨道式”的搬家式行动。部队携带着各种笨重的“坛坛罐罐”，在狭窄的小道上，前呼后拥，磕磕碰碰，互相拥挤，缓慢地行进着。这种行军方式，彭德怀称之为“抬轿子”。

国民党军队以湘江天险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后形势愈发危急。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占领了从屏山渡至界首的湘江所有渡河点，但由于湘军先期到达，失去了占领全州县城的有利时机，红二师退到桂（林）黄（沙河）公路之脚山铺一带构筑阵地，准备阻击湘军。28日，红三军团第五师赶到新圩阻击桂军。29日，红三军团第十团在界首南光华铺打响了阻击战。这三处阻击阵地地势较为平缓，装备明显处于劣势的红军与敌人进行并不擅长的阵地战，预示了这场血战的惨烈。形势越来越紧张，红一、红三军团占领湘江渡口后，中央军委纵队前距湘江最近渡河点是55公里，却走了两天。为保卫中央军委纵队顺利过江，担任两翼和后卫的各军团不得不

与敌人展开殊死决战，尽可能为中央军委纵队渡江赢得时间。

战况异常惨烈。在新圩阻击战中，部队浴血奋战三昼夜，伤亡2000多人，红五师参谋长胡震、红十四团团长黄冕昌以及副团长、参谋长、政治处主任全部牺牲，红十五团团长、政委和红十四团政委均负重伤，营以下干部大部分牺牲。在光华铺，红十团团长沈述清中弹牺牲。彭德怀随即任命杜中美接任团长。当天，杜中美又壮烈捐躯。在脚山铺，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身负重伤，敌人围攻上来时他为了避免被俘，让警卫员对自己开枪。警卫员不忍，他夺过枪开枪自尽。广大红军战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着坚强的理想信念为中央军委纵队赢得了宝贵的过江时间。

尚未过江、担任全军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十八团，被敌军分割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分壮烈牺牲。红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重伤被俘后，在敌人抬他领赏的路上，从腹部伤口处绞断了自己的肠子，献出年仅29岁的生命。

经此一役，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代价，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在广大指战员和红军战士的浴血奋战下，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主力渡过了湘江，保存了革命的火种。

湘江战役为之后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党内对“左”倾错误的领导就有所怀疑。长征开始后，这种怀疑和不满便开始滋长。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曾说“中央苏区的转移，在他们（指红军将士）中间引起了一些不满的情绪和不稳定的感觉”。湘江战役激化了这种怀疑，使得不满情绪达到了顶峰，一些指战员逐渐萌生出改换领导人的想法。湘江战役彻底宣告了“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破产。血的事实让大家逐步认识到，只有改变“左”倾错误领导，红军才能转机。

“仗没有打好，大家都不满意”，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的这句话反映了当时普遍的情绪。当时受“左”倾错误打击的萧劲光回忆，有些同志开始

偷偷议论：“老是这样被动挨打，怎能打破敌人的围剿呢？”“看来不换领导人，是扭转不了被动局面的！”担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李维汉也认为，湘江战役“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为什么一、二、三、四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而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得这么惨呢？”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刘伯承回忆：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湘江战役使得中央红军濒临绝境，“左”倾错误领导人对如此危机和重大挫折毫无办法，博古和李德都丧失了信心。聂荣臻回忆，博古感到责任重大，可是又一筹莫展，痛心疾首，在行军路上，他拿着一把手枪朝自己瞎比划。聂荣臻对他说：你冷静一点，别开玩笑，防止走火。这不是瞎闹着玩的！李德在其回忆录中也承认，突破湘江封锁线“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各部队“减员也很严重”。他说长征出发时新编成的部队到占领贵州黎平时损失达到百分之五十，预备师“甚至达到实有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

党内逐渐蔓延的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情绪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从量变逐渐到质变，为之后的历史性转折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湘江战役成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湘江战役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党内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怀疑和不满公开化，争论也开始了。进入越城岭山区，部队暂时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在前进过程中，党内对行军路线的争论日益激烈。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开始批评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周恩来回忆说：“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张闻天说：“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

直到遵义会议。”博古后来也说：“长征过程中毛主席起来反对错误领导，从湘南争论到遵义会议。”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第二天举行了紧急会议，会议否定了李德、博古关于继续向红二、红六军团所在地区推进的意见。毛泽东建议向贵州进军。这个建议本来就是毛泽东同张闻天、王稼祥讨论的结果，周恩来也支持向贵州进军。18日，在黎平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张闻天等同李德、博古等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否定了李德、博古向湘西进军的计划，决定在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

20日，中央军委纵队到达黄平。耿飆回忆有个“橘林谈话”。在一个橘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头靠头躺着，讨论当前的情形。王问张，红军最后的目标，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张的想法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泽东。这个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1935年1月1日在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再次批评了博古、李德不过乌江的错误主张，决定强渡乌江，并发布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湘江战役后这一个多月来的激烈争论，使广大指战员逐步看清了以博古、李德为代表的错误军事路线对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加上期间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逐步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湘江战役后引发的激烈争论，成为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奏。

洪超参加过广州起义、井冈山斗争及历次反“围剿”作战，战功显赫，尤其是失去左臂后依然冲在前线，却不幸倒在了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是长征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他将青春与热血毫无保留地献给了党的事业，作为长征路上身先士卒的开路先锋，他的英雄事迹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艰辛童年,自幼种下向往革命的种子

洪超，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他6岁丧父，9岁时母亲改嫁，从此与祖母相依为命。他断断续续读过几年书，为了生存，当过童工，做过学徒，沿街乞讨过，备尝人间艰辛，自幼就萌生了一种与不平社会顽强抗争的精神。

1926年，北伐军进入黄梅县。17岁的洪超首次接触到了革命，他以满腔的热血投入火热的革命之中，担任儿童团团长，带领儿童团员们配合当地的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共同斗争地主恶霸，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地主恶霸纷纷反攻倒算。洪超惨遭迫害，恶霸指使打手将他捆绑起来，在放有菱角壳的晒场上反复拖曳。菱角的尖刺穿破他的皮肤，破掉的表皮又与粗糙的地面反复摩擦，没过多久，洪超便体无完肤，伤痕累累，但他并未屈服。随后恶霸又将他绑在树上，用篾刀砍伤他的双臂，洪超顿时鲜血淋漓，几度昏迷过去，依然没有因伤痛而呻吟半句，只是从口中缓缓说出一句“要杀要剐由你”。周边的乡亲们都不下去了，纷纷站出来，指责恶霸惨无人道的行径，恶霸见众怒难犯，自知理亏，变换手法先将他关了起来，想趁夜深人静之时再投湖溺死。幸好地下党组织及时精心策划营救，洪超这才死里逃生，连夜逃往九江。后经党组织介绍，洪超进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后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学习。

奋战井冈,在中央苏区反“围剿”炮火中成长起来的独臂猛将

1927年12月11日，洪超随教导团参加了广州起义，后在韶关转入了朱德、陈毅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洪超于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南起义。同年4月底，洪超跟随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因作战勇猛、年轻灵活、干事利索，被朱德所赏识，留在身边当警卫员，并成长为红四军的班长、排长。洪超投入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反“进剿”、反“会剿”斗争中，为巩固和发展井冈山的红色政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五军一部到达宁冈新城与红四军会合。不久，为解决经济困境并打破湘赣敌军联合发动的第三次“会剿”，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留下彭德怀、滕代远率部留守。为增强留守红军的力量，从红四军中抽调一批骨干，洪超被派到红五军司令部担任参谋。此后，洪超便跟随彭德怀南征北战，参加了大冶兵暴、攻打平江县城、攻占长沙，以及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其间，因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显示出优秀的军事才华。

1932年6月，洪超在指挥草台岗战斗时身负重伤，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却永远失去了左臂。自1933年3月到1934年1月，失去左臂不足一年的洪超又投入到彭德怀指挥的进攻沙县县城的战斗中。战场上，仅剩一只手臂的洪超依然冲在一线，身先士卒，率先攻入城内，成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攻克的第一座县城。1934年8月，在高虎脑战斗中，洪超率部同敌重兵激战三日，歼敌3000多人。他也因此荣获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等“红星奖章”。

此后，红三军团在广昌以南的驿前地区组织防御，阻击向中央苏区步步逼近的国民党军周浑元和吴奇伟部的两个纵队。洪超又接受了“蜡炬形防御战”的任务。他再次冲上阵地，亲自指挥战斗。在由三个高地组成的联防阵地上，洪超到离敌最近的三营阵地，指导营长张震部署兵力、构筑防御工事。这个高地距敌约四五百米，就隔着一个小山沟，阵地上能清楚地听见敌军的鞞声和换哨时的喊话声。战斗开始，面对数倍于己蜂拥而上的敌军，洪超大声高呼：“有敌无我，有我无敌！”将士们深受鼓舞，愈战愈勇，弹药用尽仍奋勇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肉搏。正所谓狭路相逢

第一位长征路上牺牲的洪超

□ 王柳芳 孙伟

勇者胜，最终在洪超的英勇带领下，取得了这场防御战的完全胜利。

长征开路先锋,红军将星陨落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洪超师长在出发时接到命令，率领红四师担任先头部队，作为右翼先锋，走在最前面。一路上，红四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斩关夺隘，为后续大部队开辟前进道路。为了阻挠红军进入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依托有利地形用砖石砌出坚实的堡垒，周边设机枪、步枪眼，里面贮存了充足的弹药粮食，各堡垒之间还可以互相进行火力支援。这条在信丰、古陂、安远地段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被粤军吹嘘为“铜墙铁壁，坚不可摧”。

中革军委下令：“三军团应于二十日黄昏，以一个师在其右翼队先头，经韩坊、固陂之间，寻捷径出至坪石地域，切断固陂敌人往西退路，并威胁信丰。”根据上述攻击部署，红四师奉命攻打古陂圩。1934年10月21日，红军各部陆续抵达指定地点，准备发动突围的总攻击。是日，红四师向江西省信丰县白石村挺进，遭到守敌一个团的阻击。师长洪超、政委黄克诚立刻指挥红四师投入战斗。洪超指挥红十团将敌人击溃。200多敌军惊恐万状，逃出碉堡，躲进了一座牢固的“万人祠”土围子负隅顽抗。红军很快将其包围，先是展开政治攻势，劝其投降。随后，洪超骑着马亲率一个排到前沿阵地进行侦察，突然不幸被围墙内射出的一颗流弹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25岁。后由张宗逊继任红四师师长。

黄克诚得知噩耗十分悲痛，这是他在短短两年间第三次失去与自己共事的师长，悲愤之情无以言表。随后他亲自率领红四师，高呼为师长报仇的口号，以排山倒海之势，攻破土围，一举歼灭了顽敌。彭德怀在得知自己的爱将洪超牺牲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痛地说：“洪超同志身先士卒，英勇杀敌的革命精神，值得我辈学习！”彭德怀在临终前还告诉身边的人，不要忘记洪超，说他是长征路上牺牲的第一个师长，是一名优秀的战将。

战斗结束后，在当地村民的帮助下，战友们把洪超安葬在白石村一个较高的坡体下，仅有一个小土堆。2006年清明，当地政府在洪超牺牲的地方建成了墓地，张震为纪念碑题词：“洪超烈士之墓”。



用“数理化”抓建基层

□ 王天辉

部队经常性工作体量大、要求高，既要细也要实，时时考验着带兵人的智慧。用“数理化”抓建基层，这不是贪大求洋、标新立异，而是继承传统、兼收并蓄的思考转化，其出发点始于对中央军委去年修订的《军队基层建设纲要》（下称《纲要》）的贯彻理解，落脚点在于推动部队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更加深入的发展。

在“数”字上下功夫。联系到抓建实际，就是要强化大数据思维，通过储存掌握海量信息，精准分析特点规律，实现务实与务虚的贯通、主观与客观的对接、对上与对下的耦合。要对上路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比作望远镜和显微镜，用望远镜看清方向，不能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用显微镜看清脚下而不能好高骛远。这两个镜头的聚焦点就是对表对标，紧扣上情抓建，以“仰观”之态牢牢把稳部队建设的方向之“舵”。要心中有数。对上路数重在上接“天线”，心中有权数在下接“地气”。强调“心中有数”，实际上就是要掌握部队底数，将上情与我情无缝对接，

以“俯察”之为找准部队建设路径。比如，作为带兵人，对基层官兵党团员的人数、比例，城市、农村、独生子女、大学生等不同兵源的数据比例，都要做到如数家珍，增强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要数往知来。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要求。这一要求同样适用于抓建基层，《纲要》在建设原则中明确“把握新时代基层建设特点规律，增强工作指导科学性”，就好比放风筝，风力较盛时需要放线，风力不继时需要收线，只有遵循特点规律，以“前瞻”之态搞好战略谋划，才能让基层建设的“风筝”飞得更高、更稳。

在“理”字上用实劲。联系到抓建实际，就是要求我们在抓建上知事明理、统筹梳理、彻底清理。铸魂育人上要知事明理。“明理”源于“知事”，既强调党员干部自身讲政治、懂政策、强政略，更注重引导官兵在学深悟透党、国家、军队的历史脉络中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从变化中看不变，从割裂中看关联，从

现象中看本质。责任担当上要统筹梳理。《纲要》中对各级工作职责的规定，无论是党委机关还是基层单位，都把做好工作统筹结合、关闸分流进行了强调，这就要求我们善于“弹钢琴”“转盘子”，条理清晰地建立“总台账”、绘出“路线图”、列出“时间表”、当好“施工员”。流毒顽瘴上要彻底清理。以思想上的“清”，固化实践中的“理”，全面清除政治雾霾，树牢党员干部“姓”党更“信”党的第一身份，坚决防止“党性弱化、个性扩大”。着力纠治“不靠法也敢拿办法”的陋习、“不用法也能解决问题”的误区、“不畏法也无关紧要”的侥幸、“不依法也能干好工作”的惯性。

在“化”字上求突破。延伸到“数理化”抓建中，“化”就是掌握“数”和“理”之后的转换提升和运用推广，贯通由知到行、由虚向实、由表及里的关键环节。要学会知化穷冥。把感性认识理性化、零碎知识系统化，从而得其精髓、获其真谛，以求“悟则通达”之目的。坚持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

检验理论，化文凭为水平，把智能变技能，在知行合一中不断前进。善于从来时路总结成果，立足脚下路探索启示，为奋进路找准路标。要善于化繁为简。对领导机关而言，就是要深入推进简政放权，简化办事流程，开辟“直通车”服务通道，切实做到“战士吹哨、干部报到”。对基层来讲，要善于把上级思想深化为本级思路、主要方向细化为具体方法、总体目标量化为清晰指标、原则抓法转化为实践抓手，让官兵一看就懂、一听就明。要坚持以文化人。用传统文化筑基、革命文化励志、战斗文化提气、法治文化正形，着力营造海晏河清的“正环境”、和谐融洽的“暖环境”、丰富多彩的“软环境”，打造有声有色的工作圈、有滋有味的生活圈、有情有义的交往圈，切实用文化滋养官兵身心。

